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杨亦鸣 自选集

杨亦鸣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杨亦鸣 自选集

杨亦鸣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杨亦鸣自选集 / 杨亦鸣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6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 第1辑)

ISBN 978-7-80729-799-4

I. ①杨… II. ①杨…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9355号

- 书 名 杨亦鸣自选集
著 者 杨亦鸣
责任编辑 汪允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31
字 数 55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99-4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总 序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江苏，地处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下游，千百年来，她不仅汇聚着奔涌不息的一江春水，更蕴育了代代学界巨擘。从言子、枚乘、董仲舒，到范仲淹、王艮、冯梦龙、金圣叹、顾炎武、王念孙、阮元、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再到柳亚子、顾颉刚、费孝通……一个个宛如耀眼的繁星，辉映在历史的长空，汇聚成蔚为大观的精神文化遗产。正因有了众多学术家和他们的创造，江苏被世人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堪称当之无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江苏学人秉承前辈优良的治学传统，孜孜不倦，奋力勉耕，创造了大量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谱写了上个世纪后半叶江苏学界辉煌夺目的篇章。面对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与学术精华，当梓行之，传播之，倡扬之，发展之。自1999年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用5年时间，组编并相继出版了《当代江苏学人丛书》。该丛书以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江苏籍著名学者为收录对象，多角度、较全面地反映他们的家世生平、治学经历、学术成就、道德修养和生活情趣。这套由近50部书组成的学人丛书，不仅成为弘扬江苏人文精神，展示文化强省建设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当代江苏学人丛书》收录的对象大多已经辞世，少数健在者也都过了古稀甚至是耄耋之年。面对如此状况，有人不禁会问：曾经群星耀眼的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会不会后继乏人？让我们颇感欣慰的是，当历史跨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回应实践对理论的急切呼唤，进一步繁荣发展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社科界一批中年学者承继着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继续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并

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或着眼于对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或着眼于对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历史追寻;或潜心于精深的学理探析,或专注于相关学科理论的系统爬梳。其思想观点之丰富,学术见解之深刻,理论原创性之显著,令学界刮目。可以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一批学术带头人正在崭露头角。面对这一喜人的局面,在我的提议下,2009年初召开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编辑出版《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的决定。

《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实施的“人文江苏系列研究”工程的重要项目,计划用5~8年的时间,出版数十部。这套丛书与前述那套丛书有所不同,她是以现今活跃在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为收录对象,以“自选集”的形式选编其在国内具有权威性 or 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为主体,这些论文应当能够体现其研究的学术成就和水准,曾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对推动所属领域的学科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同时介绍他们治学的心路历程、经验体会以及收录他们全部论著的目录。组织编辑出版《当代江苏学人学术精萃丛书》,既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当今江苏学人的成果和风采,也是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还是展示近些年来江苏文化大省和社科强省建设的成就。

诸事成功,人才为基。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局面,创造哲学社会科学新的辉煌,星星点点的学者群体显然力不从心,而是需要愈来愈多的社科工作者凝心聚力,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热忱点燃智慧的火炬,实现科学文化一代接一代的薪火相传。正因如此,我们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相对长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套丛书推介这些学界成功者的学术品质、治学之道和人文精神,给后学带来深刻的昭示与启迪:面对异彩纷呈的商品世界,只要我们不为物欲所动,不为世俗偏见所左右,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凭着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一腔赤诚,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开拓更加缤纷璀璨、洋洋大观的学术天地,一定能攀登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峰巅。

浩浩江流,前浪后浪。我们不仅仅期许有更多的学者和他们的成果入编丛书,而且格外希望在各种学术活动中不断增添新面孔,汇聚新生力量,壮大学术队伍——也许江苏新一代学术大师就在他们中间诞生。

洪银兴

2010年1月

学术小传

一、“非负递减函数”

“非负递减函数”是我在 1982 年研究“也”字句歧义时使用的——一个数学术语。“也”字句歧义不同于一般的句法歧义，我认为是语用歧义，由于“也”具有任意的类同追加性，因此同一个“也”字句就有产生多种意义的可能，但“也”的追加有“自然性和非自然性”的特点，即“也”字每次追加的联项越多，其自然性就越小，呈现出非负递减函数的关系，由于这个关系的确立，可以得出“也”字句前提的取值范围为 $P \leq 2^{n-F} - 1$ 。

用“非负递减函数”这一数学名词作为本学术小传第一节标题，是因为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我早期研究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表述为标新立异和跨学科研究。那时的标新立异还只是一种风格上的追求，希望能求新求异，与众不同；跨学科研究也只是实现这一风格的手段，比如用数学公式来推演和表述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和结果。当然随着知识的增加和见识的增长，这种价值取向的进一步发展自然是追求语言学研究中的统一解释和最简表达，而数学语言和建模的思想是实现这种价值取向的最佳路径。

我最初接触语言学是在上个世纪“文革”后期，当时还是一名高中学生。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直到《复活》等能找得到的“封资修大毒草”，在小学到初中之间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囫圇吞枣

了,到了这个年龄段,我的地下阅读渐渐延伸到了一些带有学术或技术色彩的著述。恰逢当时是邓小平主政的“右倾翻案”时期,老师也在教一些语法知识,于是我就把家里那些在“破四旧”时设法保存下来的尘封已久的书籍翻了出来,其中有好几本大学语言学教材,我逐章阅读下来,印象最深的是五十年代印行的史存直编著的《现代汉语讲义》,史先生的书末有一章附录,是讲结构主义音位学的,诸如 g、k、h 与 j、q、x 从音位学的角度看可否合为一类之类的问题,在那个不讲科学,没有理论的年代里,着实让我这个成长中的迷惘少年过了一把钻研科学的瘾,也使我初步体验到了理论构架的美感。不过随后下乡插队,战天斗地,一直到改革开放考上大学,都是一副文学青年的样子,从没想到要研究语言学,但冥冥之中在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下,我还是走上了语言学道路,可能少年时纠结于 phonetics 和 phonology 的那惊鸿一瞥就已经形成了我的宿命。

我在大学时代语言学研究的启蒙老师是廖序东教授、李成蹊教授和顾易生教授,1981 年我大三时发表在《语文战线》和《语文教学园地》的两篇有关讨论鲁迅作品日语借词的文章就得到了李成蹊先生和顾易生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我同时所写的另一篇有关语法方面的论文则得到了廖序东先生的指导。鲁迅作品中有“的地”、“底地”、“底的”这样结构助词叠用的现象,当时我看到的论著中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只有廖先生主持编写的《语法基础知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廖先生认为这是欧化语法,我则认为这是从日语来的。出乎我的意料,廖先生在指导论文时,没有谈我的观点对与不对,而是问我写这篇文章看了那些参考书,当我向他一一汇报之后,他又很平和地问我:“黎锦熙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和北京师范学院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这两本书看过了吗?”我说:“没有。”他就很严肃地对我说:“黎先生最早谈到这个问题。做研究,第一步是要尽量把相关的文献都读遍,否则,问题的来龙去脉搞不清楚,如何下断语?”听了廖先生的话,我明白了做学问不能靠灵机一动,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在廖先生的点拨下,我更加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 年第 3 期上。

廖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他 1937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7 月,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学校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 年春,又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 年原师范大学又独立出来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从语言学泰斗黎锦熙先生。黎先生 1915 年赴教育部之聘前曾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教员,当过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老师。此时黎先生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

任,亲自给廖先生他们一年级新生讲国语文法、国音学等课程。所以廖老师的语言学功底十分深厚,读大学时已写有多篇论文。从1981年起,廖先生陆续给中文系七八级同学开设了多门选修课,1982年上半年是我们本科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廖先生又给我们开设了《现代汉语语法学专题研究》的选修课,共讲了“怎样研究语法”、“暂拟教学语法体系的修订”、“汉语语法学简史”、“解放后几次语法大讨论”、“句子分析结果的表示法”、“现代汉语句型”、“语法与逻辑”、“语法与修辞”、“现代语法理论”等九大专题,其后,在读研究生期间,廖先生又给我们开设了“《马氏文通》研究”等课程,可以说我早年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语法学和语言学理论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廖先生的影响的。

1982年我写了《论“也”的语义和“也”字句的歧义》一文,呈请廖先生指导,两万多字的长文,廖先生在每一页上都写了许多的眉批和旁注,使我感受到了许多细致入微的东西,特别是领会到怎样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条理化,说清楚;同时也懂得了要注意不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记得当时我刚接触乔姆斯基的理论,对形式化很感兴趣,搞了好多的公式,有些是完全不必要的,廖先生一一指出,但对我从新旧信息角度分析问题给予了肯定,使我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加大了在语用方面研究的分量,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虽然我后来主要精力用于跟古德夫先生做音韵学,没有立刻将论文全文修改发表,但在国内是较早从语用层面研究语法的。所以尽管1982年以后有好几位名家写了好几篇讨论“也”字的论文,成绩斐然,但多半只注重从句法方面来分析,而没有考虑到这种由语用造成的、由语音规则解释的歧义现象。所以在近20年之后,当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以《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为题发表在《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上之后,仍被同行们认为是一篇重要的论文。(见《汉语学习》2001年第4期)

沿着语用歧义这个思路,我陆续发表了一些汉语副词的个案研究;《论副词的语用分类》算是一篇带有整体思考的文章,揭示了实际话语中语用前提不同会导致焦点不同,焦点不同导致副词语义指向不同的现象,并根据副词在句中是否会产生语用歧义,把副词分为动态副词和静态副词两类。该文曾在赵元任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第二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上宣读,后发表在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 2003年第1期上。但是我从语用角度研究语法多数情况下不是时下流行的 pragmatics,更多地应算是关注了意义和语境的 language use。

为什么要从语用的角度研究语法?我认为,首先,研究语言的语法,既要重视句法结构的描写和解释,又应该能够跳出句法,因为客观世界是多维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语义结构也是多维的,按理想的状况,不同的语义结构可以表征为不

同的线性组合的句法结构,可事实上,语义结构在表征为句法结构时由于受到某种具体语言线性组合规律的限制,形成的某种线性句法结构可能只是个空壳形式;其次,语言的结构规则(语法)有的是句法决定的,有的是语用决定的,但无论受那种因素的制约,由于受到线性组合和句法规律的限制,它都选择了某种句法形式,因此这种线性句法形式有时也会是一个空壳形式,如果不考虑语用原则的制约,只按句法规则来分析并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完全在句法平面内来解决由超句法的各种因素构成的语言的结构规律,这就是我的语法研究往往从语用角度来切入,但也关注其句法投射的原因。《试析主语槽中“NP 的 VP”结构》(载于《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就是从话篇语用分析入手,发现主语位置上的“NP 的 VP”是由上文陈述转化来的,转化导致了由对事件的陈述转变为对事件的指称,指出应当区分虽有联系但性质并不相同的两种“功能”,即单位功能和成分功能,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了从语用功能上看,“NP 的 VP”是一个向心结构,整体与核心都是指称性的,提出了不同于朱德熙等学者的处理方法。《关于〈左传〉“貳于 X”及其他》则对杨伯峻等学者提出的《左传》“貳于 X”句具有两种相反语义做了分析,最主要的观点是提出“貳于 X”格式本身的结构和意义都是统一的,不是“貳于 X”有几个意义,而是上下文语境提供和赋予“貳于 X”各种其他意思,古汉语研究同样要分清哪些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那些是语境所产生的伴随信息。其实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从《左传》杜注对“貳”的种种解释对后人的影响,就可以知道区分随文释义与综合释义,把语言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该句在具体语境中文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性。

教学语法也是我早期研究的重点之一。“文革”前,中学的语法教学主要是依据 1956 年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1 年 7 月在哈尔滨举行了一次由吕叔湘、王力、张志公等百余名学者参加的“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产生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据此推出了修订稿,并经多次广泛征求意见和修改,于 1984 年颁布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在中学试用。哈尔滨会议之后,我一直关注中学语法教学的动向,1984 年《提要》公布后,我与张成福兄陆续在北京的《中学语文教学》、上海的《语文学习》等杂志发表十余篇阐释《提要》的论文。1988 年全国统编的中学语文教材的语法知识部分开始全部采用 1984 年颁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为了配合全国教学语法体系的转轨,我们推出了近 50 万字的《教学语法新体系》一书,受到教育界好评,一年内即再版重印三次,1989 年获得全国优秀图书奖。

二、“透视分离法”

“透视分离法”是我自创的一个术语。自《切韵》以后,中国历史上许多韵书、韵图和音学杂著,大都追求《切韵》“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境界,希望能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语音系统,这种追求在明清时期尤盛。其实,从音韵学和语音史的角度看,一个大杂烩的音系当然不如单一的音系价值大。长期以来,这类著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关键在于其音系芜杂,难以理清头绪,从而失去了对语音史的论证和解释的作用,因此面对这样一个语音史上的遗产,就有了一个如何利用的问题。我在研究《李氏音鉴》过程中尝试提出并使用了一种既带有方法论意义又具有具体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可以从韵书芜杂的表面透视出其音系基础及兼列的音的性质,分离并提取出有用的语音资料,使那些久已尘封的韵书的价值得以彰显于世,我把这种方法命名为“透视分离法”。“透视分离法”其实是我在音韵学研究中追求统一解释和最简表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此作为讨论音韵学问题的第二节的标题也算是适得其所吧。

在语言学的各部门中,音韵学素有绝学之称。我大学时代的古代汉语课是顾易生教授上的,他在教学方面深有造诣,不论是讲授的内容,还是讲授的方式都极为精彩,特别是音韵学部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我又天性喜欢挑战难度,喜欢那些准入门槛高的学科,因此我对音韵学也算是情有独钟,那些看似枯燥乏味的字母、韵部我背诵起来却津津有味。1983年我报考本校汉语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的三位导师是廖序东教授、古德夫教授和李成蹊教授,其中廖先生指导现代汉语专业语法方向,古先生指导汉语史专业音韵方向,李先生指导汉语史专业训诂方向,我作为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在论文撰写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古德夫教授指导的音韵学方向。

业师古德夫教授是一位学养深厚又富于独创精神的音韵学家,也是黎锦熙先生的高足。1939年抗战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冲破重重封锁线奔赴陕西城固,考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其前身为北京师范大学),古先生的音韵学课程就是黎先生讲授的,课后他撰写了《说文声符古今通检》、《唐河音系》等论文。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古先生一直与黎先生和魏建功先生等保持联系,多所请益,他给我们讲授音韵学使用的讲义就是黎先生1963年亲自审阅过的。古先生在汉语词汇、语音、语法和训诂学等领域均有研究,但用力最多的还是音韵学。他对中古音的研究造诣很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细研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王三”),后又陆续参照比勘“切一”、“切二”、“切三”和“王一”、“王

二”以及唐五代其他《切韵》修订本的残叶断片等,这些唐写本先后曾著录于《瀛涯敦煌韵集新编》、《敦煌掇琐》、《十韵汇编》、《唐五代韵书集存》等书,但最早真正利用这些资料做系统研究的当推古先生。古先生的工作有许多重要的发明,比如学界一直认为“一般所谓‘切韵系统’,也就是‘广韵的系统’”,(王力《汉语史稿》上册49页)《广韵》的反切“是依照陆法言《切韵》的”,(王力《汉语音韵学》177页)古先生利用上述各种存世与出土的文献资料以去声小韵反切为例,逐项比勘统计,首次发现《广韵》改变《切韵》的反切将近一半,因而《广韵》的反切决不全是《切韵》的反切,《广韵》已非《切韵》。(见古德夫《〈广韵〉反切的来源——〈切韵〉到〈广韵〉反切的改易》,《中国语言学报》第四期)在教学方面,古先生也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记得古先生的课程考试往往要考十几个小时,早上到古先生家开始做题,中午不休息在古先生家吃完师母做的饭继续做题,晚上掌灯时分才能结束。

古先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骨子里是意气风发的,但我感觉先生为人非常低调,文章写作和发表都相对较少,与我们所了解的他所做的研究工作是不相称的。我多年之后才知道古先生大学期间因品学兼优曾为学校推荐到暂居城固西北联大附近的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家做过家教,因此抗战胜利后得以在河南省政府做过一阵子文员,可以想见这个“历史问题”是如何成了压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现在想来,刘茂恩先后作为十三军团和十四集团军司令,抗战时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中条山战役和忻口战役,歼敌数万,当时在国统区算是抗日英雄,一个青年学子焉能妙算后事,况且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古先生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本质,毅然弃政从教,于1948年10月进入省立开封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并任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1949年,进入苏南公学、苏南教育研究班学习,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但“历史问题”还是给古先生后半生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和压抑,而这多年的压抑又严重损害了古先生的身体。在我的印象中,古先生和师母常年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古先生身患多种疾病,如双传导阻滞、心脏功能弱化、眼疾、严重肺气肿等,有时在课堂上声断气连,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但先生或喷药或吃药,咳嗽消停后,继续勉力讲课,令人动容。我的硕士论文完成后,古先生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抱病披阅的。改革开放后,形势日渐好转,古先生有心想把失去的岁月补回来,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里遂录古先生1986年的一则日记,可以看出其晚年的工作、生活的状态:“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抄小韵考。现在脑力不行,心力慢性衰竭,眼力近于失明,实在已经不能工作了,但是,还不甘心,争取一、二年内,完成几部稿子,三韵异同已具轮廓,古文字基础可作讲义印出,汉语音韵争取明年修改完毕,作讲义印出。”其实,古

先生此后已很难继续工作了,但先生还是整理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汉语中古音新探》,是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而此时距先生辞世已经三年了。

我的音韵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音领域,当年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关于清代《李氏音鉴》的专书研究。我的这一选择受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我非常赞同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语言学史一瞥”里提出的不要试图一下子构拟原始印欧语,而是要利用晚近的语言从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等语族的研究开始,逐层上溯,我觉得汉语史的研究应该借鉴这一思路,那时我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想系统研究汉语语音史,所以先选择了近代音领域;二是我那时发愿想写一本普通话语音史,一方面那是汉语语音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对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现代汉语语音规范化也有重要意义,但可供使用的反映北京音系的材料少之又少,我就想先逐个研究与北京语音有关的明清韵书、韵图和诗文押韵等,而《李氏音鉴》的作者李汝珍是清代大兴人,成人后又长期生活在海州板浦,对那里的方言我有一定了解,因此决定研究《李氏音鉴》。其实,自20世纪初以来,众多的学者如钱玄同、胡适、白涤州、赵荫堂、王力、陆志韦、俞敏、史存直、李新魁、何九盈等都相继肆力于《音鉴》的研究,可是我的直觉是对于《李氏音鉴》的研究还有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尚未解决,比如权威的观点是《音鉴》音系南北杂糅或是北音与吴音的综合,因此减少了其价值等等,劳乃宣甚至斥之为:“其书文辞辨博,徵引浩繁,类有学者所为,故浅人多有所震,其实未窥等韵门径。”

但要真正超越前人谈何容易,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如仍用以前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只是修修补补,很难有新的发现。经过三个月的潜心思考和对长编材料反复分析,我终于从困兽一样的绝境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一天我正在阅读藤堂明保日文版的《中国语音韵论》,突然“透视分离法”一词在我脑海中横空出世,像一道电光石火,激发了我的灵感,使我洞悉了《音鉴》音系的奥秘。这样《音鉴》安排音系的方式及兼列南北的实质均昭然若揭,接着我又顺利地揭开了李汝珍的粗细理论的实质和反切的特点,发现《音鉴》的粗细兼指声韵,反切上字决定介音,与《切韵》以来的传统反切大不相同。由于前人没有看出《音鉴》这些完全不同于以前经典韵书的特点,所以许多结论都有偏颇之处,而我们则运用“透视分离法”从《音鉴》音系中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两百多年前的北京话语音系统,这样《音鉴》对研究普通话语音史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的这篇论文因为“离经叛道”的东西太多,能否通过答辩,更重要的是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可我甚为担忧,连古先生都说“不易为人接受”。事实上这种担忧后来证明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但我的确非常幸运,两位答辩委员兼评审专

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曹述敬先生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徐复先生对我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支持。曹先生不仅整体上予以肯定,还随文批注,画出了许多惊叹号,曰“精细”、“创新”等;徐复老的评语更是鼓励有加,他说:“李汝珍的《李氏音鉴》以往确实有不少人研究过,但都不够翔实,作者杨亦鸣同志熟于近代汉语语音史,写了这篇论文以弥补这一缺憾,他的论述和分析,都很中肯,为研究普通话语音史作出了贡献。”还说:“作者对《李氏音鉴》音系的性质,提出它的语音基础是北京音,从而排除了其他学者的一些论定,非常可贵。三点理由,具有说服力,也可以说是作者的精义所在。”“作者对《音鉴》的声、韵、调系统,做了详细论述,他指出李氏书中的‘切异粗细’,即反切上字决定介音,对读者启示很大。”“他把《音鉴》列为十八世纪末的北京音系,言之成理,是可信的。”“作者的研究方法,除归纳法、比较法外,还采用透视分离法,说法新颖,有独创性。论文写得是成功的。”著名的近代音专家杨耐思先生也多所谬奖,他后来在给我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1986年秋天我有幸读到这个初稿,顿感颇多新意”,认为本书“涵盖了近代汉语语音史的许多新颖的见解,观察入微,论证周密,算得上这个学术领域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特别提到前人对《音鉴》的研究功不可没,但“关于《音鉴》的详细内容或深层情况仍然不被世人所知,它所代表的音系究竟是怎样的性质?它的‘南北方音兼列’的实质是什么?‘北音’、‘南音’究竟各何所指?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也还没有弄清楚”。杨先生认为我的工作“揭示了《音鉴》的详细内容和它的特色,通过多维考察,理性审视,摸清了李汝珍的粗细理论和反切特点,李氏关于音系的描写和处理方式的具体细节,从而发现《音鉴》所代表的音系并非有些学者所断言的,是一个南北方音杂糅体系,而是一个以当时北京语音为基础,兼顾当时以板浦为代表的海州语音而构成的体系”。并指出这一“关于《音鉴》音系的性质的发现非常重要”,“扫清了笼罩在《音鉴》之上的层层迷雾,显露了它的庐山真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亦鸣同志创获的新的研究方法——透视分离法并在应用中获得成功的经验,对于研究明清音韵专书也有重要的意义”。

1992年《李氏音鉴音系研究》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后,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及内地的一些重要学者和重要著作、刊物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引用达百余次。许嘉璐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刘坚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都在“音韵学”部分介绍了这一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在介绍新时期音韵学研究主要成绩时也指出:“在古代实际语音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基

本上是历史比较法,创新较少;但在近代音研究中,除了对上述音韵学著作有所深入外,在方法上也有革新。如杨亦鸣的《李氏音鉴音系研究》……”台湾《声韵学会通讯》第五期刊载署名文章《近五年来大陆地区汉语音韵研究概况》除了在“近代音研究”一章中详细介绍《李氏音鉴音系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学界评价外,在“结语”一章中对大陆音韵学研究做全面总结时,指出大陆音韵学“在研究方法上则更趋科学化,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杨亦鸣于研究李氏《音鉴》所使用的‘透视分离法’”。

1990年起,我开始指导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运用“透视分离法”对《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正音咀华》、《正音切韵指掌》、《正音撮要》、《圆音正考》、《音韵逢源》等韵书做研究,通过对作者的生平、交游和韵书的体制、性质的分析,透视出杂陈于同一框架中兼列的各种不同来源和不同层次的音,从而透过芜杂的表面,破译其音系性质,廓清了许多学者的误解。比如《正音咀华》是清代后期的官话音课本,研究过此书的学者对这本书的音系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共同点都认为此书没有反映当时的北京语音。运用“透视分离法”可以发现《正音咀华》实际上有两套音系:一套是由于迁就传统韵书而列于表面的比较保守的音系,另一套是通过注音的方式而反映出来的当时的官话音。所以《正音咀华》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前期的北京话语音。使用“透视分离法”要注意作者的任何一种经历或韵书本身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应该作为变量加以考虑,比如沙彝尊、裕恩等满人的音学著作,一定要考虑作者母语满语和满文因素的影响。以《音韵逢源》为例,该书是一本同音韵谱式的等韵图,成书于清道光庚子年(1840),作者裕恩是清正蓝旗人,该书记录有尖音字和团音字,并注有相应的满文译音,以前许多研究者都以为该书因分尖团而不能反映北京音系,其实《音韵逢源》将精组细音与见晓组细音分开是人为区分的结果,是一种假象,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满汉译音中的国名、地名、人名的还原问题,应该说早在《音韵逢源》时代之前,北京音系中的尖团音就已经舌面化了。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考虑到作者身世、母语背景和写作动机,我们就能够搞清楚这类韵书的音系性质、地位和作用。(详见《〈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分合之比较研究》,《中国语文》2003年第2期)

我对音韵学不仅在研究上乐此不疲,在教学上也十分倾心。我觉得音韵学应该摘掉绝学的帽子,在其入门阶段既要让初学者领略到音韵学是一门科学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前沿学科,又要让初学者感受到音韵学是一门通俗易懂饶有兴味的很有实用价值的传统学科。为此,我和顾易生先生合作编写了一部适合初学者阅读的音韵学入门书《音韵易通》(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在内容上,举凡音韵学研究的基本材料、基本方法和重要结论以及有关知识,都力

图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在形式上，则把这些内容归纳为若干个题目，每题集中谈一个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行文中注意联系语文课本和文学作品的例子，深入浅出，使素有“绝学”之称的音韵学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张世禄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十分赞赏本书将“学理”和“事例”两相解释的办法，认为达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要求，“其有助于教学之改进和音韵知识之普及者可谓大矣”。

三、“神经机制”

“神经机制”大概是我近十几年来学术活动和所发表的文章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所以就选它作为以讨论神经语言学为主要内容的第三节的标题。

我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的，1990年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也是在这一年，我开始担任系副主任，分管科研、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工作。由于工作职责的需要，必须考虑学科建设问题，于是选择新的学科生长点，成了我首要的工作。1994年之前，我主要从事的是现代汉语和汉语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我对普通语言学的历史和理论的兴趣一刻也未停止过，从洪堡特到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当时能看到的著作都搜罗殆尽，大快朵颐。因此虽然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中文系还没有开设语言学概论这门课，但我研究生毕业后在担任古代汉语课程的同时，也开始为本科生开设语言学概论课。从85级开始，一直到现在，只要有时间我都尽量给本科生上这门基础课。1994年我担任行政工作，启动新一轮硕士点的申报，首要目标自然锁定在语言学硕士点（我校当时与语言学类有关的硕士点已有现代汉语和汉语史两个二级学科，语言学二级学科在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后更名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我作为学科带头人整合全校的力量，专门成立了语言研究所开展语言学的研究，1995年语言学硕士点顺利申报成功，这也是这一年全校唯一申报成功的硕士点。但在语言学研究方向的设计上，我没有按照传统的语言学的老路走下去，而是选择了国内尚未开展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道路。这是因为我一直追求语言学理论的前沿性，并且认为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理论代表了语言学研究的方向，但是在一路跟踪到乔姆斯基最简方案时，我却产生了一个疑问，生成语法将语言研究的焦点从说者拥有的语言知识系统转向人类语言能力，语言学实际上就成了认知科学的一部分，而生成语法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的研究能够达到它自身的研究目的吗？联想到我读过的卢利亚的《神经语言学》，尽管这本书的理论背景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但其实证和定量的研究应该是研究语言脑机制的必由之路，当然我也知道神经

语言学需要具备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失语症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还只能依赖脑损伤病人)等语言学之外的许多知识,但这正激活了我一直追求的挑战难度、求新求异和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取向,所以我毅然选择了神经语言学作为我们团队研究的主打方向。

应该说工作需要、学术背景和价值取向决定了我的这一战略选择。但这一选择也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责难,我在《语言的神经机制与语言理论研究》一书的序中说过“期间的困顿与辛苦不足与外人道也”。所幸的是这一战略选择使我们的工作完全融入国际学术前沿。乔姆斯基本人实际上也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为语言系统及语言系统的使用提供物质基础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因此当神经语言学成为显学,走进当代学术前沿时,乔姆斯基对神经语言学给予了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方法可以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区别开来。(斯特尔梅、乔姆斯基《乔姆斯基在线访谈:语用学的性质和相关问题》,沈兴安等译,《语言科学》2003年第1期)如果说我们前面讲到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是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和主流,未必能得到各种语言学流派的认同,那么说神经语言学是当代语言学的前沿学科应该没有争议了,因为不仅乔姆斯基1999年以来已连续在《脑与语言》、《影像、语言、脑》等杂志发表与语言脑机制有关的论文,就是功能和认知学派的主要学者也走向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比如兰姆在20世纪最后十年致力于大脑神经科学的学习,将其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升格”为神经认知语言学(neurocognitive linguistics)。(悉德尼·兰姆《兰姆教授谈神经认知语言学》,程琪龙采访、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Lakoff和Feldman在上世纪末也开始研究语言的神经理论。(Lakoff and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年版)因此可以说当代形态的理论语言学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已经合二为一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经语言学呢?我给它下的定义是: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集语言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为一体,专门研究语言习得、生成和理解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研究大脑如何产生、接收、存储和提取信息,从而探讨脑与语言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各学科门类交叉综合的发展态势,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前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充满活力的未来。需要说明的是神经语言学虽然是一门交叉学科,但它本身不是一门应用学科,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探讨语言脑机制的基础学科。但是它的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医学临床应用上,其成果可以指导失语症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在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和认知自动化工程方面可以为探讨大脑神经网络系统提供生物学模型的直接证据,以改进目前

的数学模型的智能化水平和模拟人脑功能的能力,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还需指出的是,神经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二者并不完全相同。神经语言学仍然属于语言学范畴,其研究主旨是语言学的,即对语言神经机制的探索要以当代语言学理论为背景,并最终能够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揭示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而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探求语言在大脑中的神经基础和加工机制,其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可以为脑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经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又是有联系的,即后者是前者的来源之一。

我在神经语言学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从神经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平台搭建方面入手的。从1994年开始,我发奋学习了神经解剖学和失语症语言学,并思考了神经语言学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率先在国内开展以汉语为语料、以当代语言学理论为背景的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并于1996年起在语言学专业中开设了神经语言学方向,陆续招收了我国第一批神经语言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了我国第一批该方向的博士后,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又有共同学术指向的优秀青年才俊,他们对当代理论语言学、神经心理学、失语症学、神经生理学、神经解剖学、神经电生理学、神经影像学等各有专攻,同时又共同从事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是具有跨学科知识能够直接从事前沿交叉学科工作的复合型研究人才。我们以此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神经语言学研究团队,该团队从1997年开始,在《中国语文》、《心理学报》等刊物发表神经语言学研究论文数十篇,承担了几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部省级项目等。该团队还十分重视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与伦敦大学学院、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2001年以团队成员为骨干的徐州师范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被评为省重点学科,2002年获省优秀学科梯队称号,2005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学科实验室也于2005年被评为江苏省语言科学与神经认知工程重点实验室,2006年研究团队被遴选为“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青蓝工程”第一批优秀科技创新团队,2009年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神经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推动了国内神经语言学的发展。

在神经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面,我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中文大脑词库研究、汉语语法的神经机制研究等方面。中文大脑词库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文大脑词库形、音、义码关系的神经语言学分析》(《中国语文》1998年第6期)、《基于神经语言学的中文大脑词库初探》(《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3期)、《人脑中的基本